

□ 全卓伟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劳动力和人口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历史。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上,传统的农业技术由于机械、电力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与相对稳定的土地面积相比,农业中存在着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以“二元经济论”著名的阿瑟·刘易斯认为,只要非农业部门能够提供高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工资,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个人收入差额能够补偿城市的过高生活费和因劳动力流动脱离了原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心理成本,农业劳动力就会大量地流入发达地区非农业生产部门。这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目前,农业劳动力在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总劳动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大多数在10%以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人口的份额,农业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份额以及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的份额都属绝对优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我国是典型的劳动力剩余国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的过剩相应产生的劳动力的过剩。人口的过剩是相对于有限的自然资源、生产原料、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活动规模而言的。此外,我国从1953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到1979年劳动力所占比重仍在75%左右,工业化30年来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近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才开始出现。

由于我国剩余劳动力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原因,因此我国解决剩余劳动问题不能走欧美的老路。我国解决剩余劳动力首先可以逐步提高第二、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根据1985—1994年统计资料整理,^①这期间我国共有5316.3万人从农业劳动中转移出来,其中87.54%流向第二产业,12.46%流向第三产业。具体过程是:80年代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连年丰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物质条件。1985年农业劳动力流向第二产业的人数较1984年翻了一番。随后转移速度开始放慢,但仍保持递增趋势。1989年由于连年经济过热,政府开始治理整顿,采取紧缩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迅速回落,逐年的转移人数只有少量的增加。从1992年至1994年,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地增长,农业劳动力在第三产业的比重保持不断上升的势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由第二产业占主要地位转变为第二、三产业并重,尤其是第三产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势头更猛。对此,应注意的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一定的限度,农业的剩余产品能养活多少第二、三产业人口就是剩余人口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的限度。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能在这一限度内进行,一旦突破了这一限度,就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效应,会同时制约

一、二、三产业的发展。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另一个途径是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镇生活消费品价格放开,住房、医疗制度改革的推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提供了机会;城市优厚的工资收入、良好的居住环境吸引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据统计资料^②,农村劳动力在城镇新就业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从1980年的14.15%升至1994年的27.27%。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部分流入小城镇、卫星城镇,小部分流向大、中城市。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主要以手工为主,农业劳动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所以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外延性转移为主。小城镇的生产技术水平较低,对剩余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大,大、中城市的市政建设、建筑业、环卫工作也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尽管市场经济为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其转移规模、形式、速度仍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就业压力,同时还增加了城市社会治安、交通的压力,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大多数属于青壮劳力,并且具有相当程度的知识和技能,这又会进一步减少农村中的高质量劳动力,加剧农业生产的困境。

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表现为区域不平衡,流向偏重于东部地区。由于我国人民的民族特性,在中国实行移民政策是行不通的,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转移仅作为劳动力转移的补充现象存在,并非主要途径。根据1994年的统计资料,在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中,东部地区占43.7%,高出中部地区9.5个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21.5个百分点;在第二产业中,东部地区高出中部地区27.1个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42.7个百分点;在第三产业中,东部地区高出中部地区21.8个百分点,高出西部地区37.8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虽然东部地区在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也超过中西部地区,但东部地区的农林牧副渔产值在总产值中占57.1%,超过中部地区26.5个百分点,超出西部地区44.8个百分点,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相比,东部地区以相对较小的劳动力优势取得了相对较大的总产值优势。再看工业总产值指标,东部地区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9.4%,超出中部地区48.7个百分点,超出西部地区59.5个百分点,与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相比,东部地区同样以相对较小的劳动力优势取得了悬殊的比较利益优势。仅就这两项指标来看,无论从就业人数还是从总产值角度,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的优化方面都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趋向于东部是明显的趋势,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改革中的中国正在逐渐形成区域经济,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异日益显著,这一比较利益优势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劳动力转移的区域性不平衡也将长期存在。

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愈来愈受到技术创新和资本投入的限制。根据1991—1994年^③数据显示,乡镇企业在这期间新增2752万人,其中80%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然而,发展至今,乡镇企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正逐步减弱。根据1984—1994年间的乡镇企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原值和劳动力人数三项统计数据(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4、1995)进行回归分析,可得到1984~1989年间,回归方程 $\ln Y = -4.30 + 0.86 \ln K + 0.74 \ln L$ 各项检验均已通过,生产函数变形为 $Y = 0.014K^{0.86}L^{0.74}$,即资本投入增加1%,产值增加0.86%,劳动投入增加1%,产值增加0.74%, $0.86 + 0.74 = 1.60$,生产基本上属于规模报酬递增,在产值的年均增长率27.74%中有19.15%来源于资本投入的增加,7.60%来源于劳动投入的增加,只有1.40%来源于技术的进步。以1990—1994年的数据回归拟合, $\ln Y = -6.80 + 1.29 \ln K + 0.65 \ln L$ 即 $Y = 0.0011K^{1.29} \cdot L^{0.65}$ 检验通(下转第63页)

其是大专院校师生的实际需要。

3. 实务介绍与理论分析相结合。金融期货与期权本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但本书作者却并不是简单地介绍具体的实务,而是在实务介绍的同时,辅之以较多的理论分析,从而使实务介绍与理论研究融为一体。这在国内出版的同类著作中也是比较少见的。我们不难看到,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大量有关金融新业务的著作中,往往存在着客观介绍较多,而理论分析较少的倾向。这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不合理的倾向。因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必然有它的内在规律,任何金融新业务的存在,也总有它的理论根据。因此,只有将实务分析与理论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当然,要做到这样是并不容易的,它要求作者既熟悉业务,又精通理论。所以,我认为,《金融期货与期权》一书之所以有此特点,实际上

也正反映了作者有着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

4.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论是金融期货,还是金融期权,都既是一种新业务,又是一种新技术,它们本身都有着相当的复杂性。本书作者用比较浅显的语言来加以简洁明了的说明,并用实例和图表作比较直观的分析,使读者易于理解、易于掌握,从而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撰写本书时,曾参阅了大量的外文资料,但在实际写作过程中,他却完全用“中文化”的语言来加以表达,从而避免了生硬的直译和简单的拼凑。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读者理解本书的能力。

当然,本书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例如,本书对我国金融期货市场与金融期权市场的建立与发展还缺乏应有的分析;对金融期货与金融期权的定价的分析,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深入。

◎◎◎◎◎◎◎◎

◎◎◎◎◎◎◎◎

(上接第48页)过。分析显示,资本投入增加1%,产值增加1.29%,劳动投入增加1%,产值增加0.65%, $1.29+0.65=1.94$,规模报酬递增的速度加快,在产值的年均增长率38.16%中,有31.74%来源于资本投入的增加,3.57%来源于劳动投入的增加,只有2.85%来源于技术的进步(限于篇幅,以上计算过程略)。这两个时期的分析表明,技术进步在乡镇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极为有限,乡镇企业产值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今后的发展中,如果仍以乡镇企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阵地,不仅限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而且将难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为弥补这一缺陷,今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应实现多种经营,建立涵盖一、二、三产业的农工商联合体,建立规模更大的企业集团。在产销连锁网上下大功夫,并且实行市管县,以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大力吸引农村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素质。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打破了产业和地域的限制,具有全方位的特点,限于经济发展的现状,这一特点在一定时期内仍将长期存在。要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由无序转向有序,尽可能地减少转移过程中的成本消耗,尽可能地消除劳动力由于时间、空间上的转移为城乡之间和产业结构间带来的冲击,笔者认为,应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相对于土地过剩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要促使这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从农村流入城镇,为经济发达地区提供大量的金融、保险、法律、咨询等服务,这才是发展中国家解决二元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

注:

①《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330页整理计算。

②《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299页。

③《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106页整理计算。